

余尝考论

张舜徽 著

清代学术，

以为

吴学最专，

徽学最精，

扬州

之学最通。

无吴、皖

之专精，

则清学不能

盛；无扬州

之通学，则

清学不能大。

江淮繁富，为天下

冠。士有负宏才硕学者，

不远千里百里，

往来于

其间。巨商大族，

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。

兼有师儒之

清代

扬州学记

广陵
书社

■ 张舜徽 著

清代扬州学记

广陵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清代扬州学记/张舜徽著. —扬州:广陵书社,
2004.8
ISBN 7-80694-060-X

I.清... II.张... III.①学术思想—思想史—中
国—清代②文学流派—研究—中国—清代
IV. B249.9②I209.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7383 号

书 名 清代扬州学记

著 者 张舜徽

责任编辑 曾学文

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

扬州市凤凰桥街 24-6 号 邮编 225002

发行部电话 (0514)7343427

网 址 www.yzqlpub.com

E-mail: glss@yztoday.com

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扬州市运河西路 215 号 邮编 225003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625 插页 2 页

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7-80694-060-X/Z·5

定 价 15.00 元

广陵书社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均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前 言

这本书是十多年前,我在兰州教书时,所撰《中国近百年学术史》的一部分。当时着重阐述扬州学派,原名《扬州学记》,是用文言文写的,没有写完便停笔了,其中《叙论》部分,曾刊入《积石丛稿》(有1946年排印本)。现在重新整理、补充、修订,写为语体文,并改用今名。关于叙述体例,有下列几点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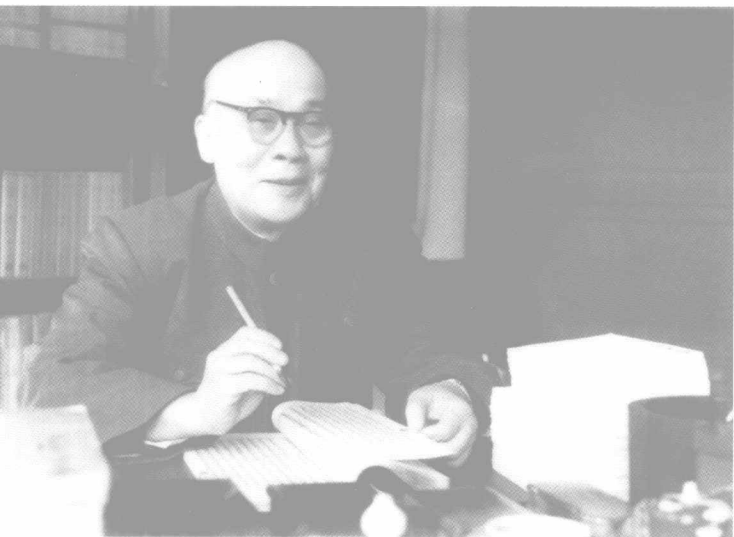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此书旨在阐述清代扬州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和治学方法,抽举几位较为重要的中心人物为主题,次要者附见。

二、清代扬州府治,领二州(高邮、泰州),六县(江都、甘泉、仪征、兴化、宝应、东台)。今兹所述,不越此限。

三、扬州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的特点,都在《叙论》中首先概括地加以说明,至于详细进行分析或批判,则分见各专章。

四、此书以介绍清代扬州朴学家为主要内容。近人刘师培,因与他们关联较为密切,故亦列入。最近几十年间继起的学者或现在还健在的人,例不写入。

五、书后所附一表,系依据各家年谱、传志辑述而成。但主要取其中与学术有关者列入,其他琐事,概屏不录。



张舜徽先生（1911—1992）

三月初四日

大陽曆四月八日

晴

自來言義理者或託道學之名以自標或避道學之名以自掩



庵則曰道學二字亦甚平常謂其道之所在而學之凡非道之事必不

敢學也而世之人見其守道不惑遂以為道學而譏之笑之非真能見

其為道學而尊之也若未能學問而誇於人曰吾道學也此天下之

至愚也僭也妄也故務道學之名而自誇於人固不可避道學之名而

不求其實更不可

正誼堂續集卷五與友人

此言精切透闢足以發俗士之鄙復有

所學未成而好輕議前哲者敬庵為著述說以箴之曰二程夫子最為

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已多大凡前人之說有

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說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為發前人

出版说明

《清代扬州学记》是现代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系统论述扬州学派的代表性著作,也是他关于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。

张舜徽(1911—1992),湖南沅江人,著名历史学家、历史文献学家。一生勤奋治学,创获极多,先后出版著述二十余种,于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均有建树,其为学可谓博大精深,自成体系。对于其学术道路,他在《八十自述》中有一段精辟的自我总结:“余之治学,始慕乾嘉诸儒之所为,潜研于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者有年。后乃进而治经,于郑氏一家之义,深入而不欲出。即以此小学、经学为基石,推而广之,以理群书,由是博治子、史,积二十载。中年以后,各有所述。”其著述如《广校雠略》、《中国文献学》、《清人文集别录》、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》等,均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扬州学派是清代乾嘉之际继吴、皖二派之后又一个重要的地域性学术流派,其代表人物大多为扬州府籍学者;因其时扬州交通发达,商业繁荣,文化昌盛,又吸引了当时各地有名望的学者,纷纷来扬讲学;大家相互讨论切磋,相互启发激励,学术研究风气非常浓厚,学术研究成果亦十分丰富。近代学者尹炎武在所撰《刘师培外传》中,较早提出了“扬州学派”一说,他认为:“扬州学派,盛于乾隆中叶。任、顾、贾、汪、王、刘开之,焦、阮、钟、李、汪、黄继之。凌曙、刘文淇后起,而刘出于凌。

师培晚出，席三世传经之业。门风之盛，与吴中三惠、九钱相望。而渊综广博，实龙有吴、皖两派之长。著述之盛，并世所罕见也。”

系统研究扬州学派，则自张舜徽《清代扬州学记》始。张先生对于扬州学派的研究，大约始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并有《扬州学记》未完稿一篇，其中《叙论》部分，曾刊入《积石丛稿》。五十年代末，他对原稿重新整理、补充、修订，定名《清代扬州学记》，于196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该书《叙论》中说：“余尝考论清代学术，以为吴学最专，徽学最精，扬州之学最通。无吴、皖之专精，则清学不能盛；无扬州之通学，则清学不能大。”于是，书中广征博引，对扬州诸儒之“通学”详加论述，广为彰扬。叙述较为平实，议论颇为精当。其书至今对研究扬州学派仍具有参考价值，为学术界所重视。

此次重印，以上海人民版为底本，对原书引文尽量作了核对；对个别错别文字作了订正；文字改动及少数有疑义处，以〔〕号标出，另出校勘记，附于书末；对部分标点符号按现行规范用法作了修改。

广陵书社

2004年9月

目 录

前 言	1
第一章 序 论	1
第二章 王懋竑	19
一 王氏生平和著述	19
二 王氏治学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努力	24
三 王氏对朱子之学的贡献	29
四 王氏最亲密的学侣——朱泽沄	37
五 王氏乡里后学的继起——刘台拱、朱彬、刘宝树、刘宝楠、 刘恭冕、成蓉镜、刘岳云	40
第三章 王念孙(附王引之)	55
一 王氏父子的生平和著述	55
二 王氏的训诂学	61
三 王氏的校勘学	73
四 王氏最亲密的学侣——任大椿	80
第四章 汪 中	89
一 汪氏生平和著述	89
二 汪氏对于儒家正统思想的批判	93
三 汪氏治学的识见与规模	98
四 汪氏家学的继起——汪喜孙	102
五 汪氏最亲密的学侣——江藩	106
第五章 焦 循(附焦廷琥)	113
一 焦氏生平和著述	113
二 焦氏治学的精神与态度	118

三	焦氏治学的识见与规模	123
四	焦氏的经学和史识	130
五	焦氏的哲学思想	137
六	焦氏最亲密的学侣——黄承吉	145
第六章	阮 元	151
一	阮氏生平和著述	151
二	阮氏的训诂学	155
三	阮氏的考证学	160
四	阮氏的哲学思想	167
第七章	刘文淇 (附刘毓崧、刘寿曾)	175
一	刘氏生平和著述	175
二	刘氏的经学	181
三	刘氏的校勘学	188
第八章	刘师培	195
一	刘氏生平和著述	195
二	刘氏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成就	201
三	刘氏研究经学和校释群书的工作	210
四	刘氏的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	214
附 录	清代扬州学者年表	221
附校勘记		237

第一章 叙 论

人们谈到清代学术,便容易提出“考证学派”四字来概括二百七十年间学术界的主流。其实,清初几位大师,像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刘献廷、颜元、唐甄,都具有丰富的社会思想和民族思想。规模弘伟,绝不是“考证”二字所能范围。道光以下的学者们,又大力提倡“经世致用”之学,不甘心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埋葬在故纸堆里,事实上,也和“考证”绝然殊途。真正当得起“考证学派”这一名目的,只能算是乾隆、嘉庆年间,亦即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期的学者们。这一时期的学术界,过去旧史家称之为清代学术的黄金时代。但是他们自少至老,只是为考证而考证,完全脱离了现实生活。只知有古,不知有今。当时树立了“汉学”的旗帜,在烦琐的考证工作内兜圈子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经部总叙》指出当时治学情况,认为“其弊也琐”。用一“琐”字概括当时学者们的流弊,是比较恰当的。

我们要问:为什么乾嘉学者们愿意将自己有用的岁月投入烦琐的考证工作中呢?这是有他们的时代背景和不得已的苦衷的。当清代初年,屡兴文字狱,如康熙年间的庄廷钺、戴名世两

案,以及雍正、乾隆年间的查嗣庭、吕留良、胡中藻、王锡侯、徐述夔等案,大批学者文人被屠杀了。于是读书识字的人们,人人自危,首先不敢研究明末史事,怕触犯忌讳;也不敢多写诗文,怕无故惹祸。于是他们集中精力研究经学,从事校勘和笺注的工作。由此而旁及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天算、地理、金石、乐律、典章制度等方面。专家辈出,著述日丰。凡经过他们整理的古书,解释明确,使读者节省了许多精力。他们在搜集、辨别、整理材料上,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。可是他们共同的缺点,那就是迷信古人的思想和烦琐考证的方式,对乾嘉以下两百年来的学术界,起了不好的影响和作用。

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的,莫不认为“汉学”兴起时,有吴、皖二派。吴派以惠栋为首,皖派以戴震为首,卓然称两大师。很少有人注意到扬州学者们在清代学术界中所起的重大作用。我从前写《扬州学记》时,在序言中说过:

余尝考论清代学术,以为吴学最专,徽学最精,扬州之学最通。无吴、皖之专精,则清学不能盛;无扬州之通学,则清学不能大。然吴学专宗汉师遗说,屏弃其他不足数,其失也固。徽学实事求是,视夫固泥者有间矣,而但致详于名物度数,不及称举大义,其失也偏。扬州诸儒,承二派以起,始由专精汇为通学,中正无弊,最为近之。夫为专精之学易,为通学则难。非特博约异趣,亦以识有浅深弘纤不同故也。郑康成之所以卓绝以此耳。清儒专门治经,自惠、戴开其先,天下景从而响和者,无虑皆能尽精微而不克自致于广大。至于乾隆之季,其隘已甚,微扬州诸儒起而恢廓

之，则终清之世，士子疲老尽气以从事者，杂猥而已耳，破碎而已耳。末流之弊，不知所届，庸讎止于不能昌明经训已乎？吾之所以欲表章扬州之学，意在斯也。

这虽然是我早年的见解，也还道出了扬州学术值得重视的原因。的确，吴、皖两派学者所走的路，是比较窄的。特别是惠栋，盲目崇拜汉人，无原则地把汉人旧说看成至宝。由好古、信古，乃至佞古、媚古。这种弊病，也只有扬州学者能够大胆提出加以批判，如焦循和王引之都对惠氏治学方法指责过^①。戴震治学范围比较惠栋宽阔些，方法也比较缜密，有实事求是的精神。他的优点，全被扬州学者们继承了，并且发展了。扬州学者治学的特点，首先在于能“创”，像焦循的研究《易经》，黄承吉的研究文字，都是前无古人，自创新例。其次在于能“通”，像王念孙的研究训诂，阮元的研究名物制度，汪中的辨明学术源流，都是融会贯通，确能说明问题，这都是吴、皖两派学者们所没有，而是扬州诸儒所独具的精神和风格。他们这一类的治学方式与方法，如果拿今天的尺度去衡量，诚然有他们的缺点和错误，但是对当时那般笃信谨守、褊狭拘隘的学术气氛来说，仍然有它客观上的进步作用。我们今天对扬州学派所以还有重视的必要，道理便在这里。

还有一点特别应该指出的：乾嘉学者中绝大多数，从事考证名物、训诂、典章制度，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有它的历史地位，但是流于烦琐，失掉了十七世纪学术思想界弘伟活泼的

① 详见《王文简公文集》卷四《与焦里堂先生书》。

气象,谈不上个性的发展和见解的创辟。这应该说是十八世纪的中国学术思想界晦塞的一面。扬州学者们在这方面弥补了这一缺憾。像汪中、焦循、阮元都能大胆的对一些问题,特别是对伦理方面的问题,提出自己的看法,继皖学戴震之后,给宋明唯心主义的理学以严厉的批判。所以扬州诸儒的哲学思想部分,更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。

过去许多学者谈到扬州诸儒哲学思想时,认为是受戴震的影响很大,也可以说直接渊源于戴氏。这种论断,似乎是可以成立的。一则由于戴氏留寓扬州最久,早已将他的议论主张带到了扬州;二则扬州几位大学者,如王念孙是戴氏弟子,任大椿是戴氏同事,焦循虽出生略后,但一生最推尊戴学,我们只看他所做的《申戴篇》,可以肯定他的治学,是私淑戴氏的。那末,扬州学术,无疑是与戴震有比较深厚的关系了。如果再上推一下,戴氏的学说思想,又是源出谁家呢?也是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索的问题。

当1923年,值戴震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,梁启超写了几篇论文来纪念他。其中《戴东原哲学》一篇^①有这样一段话:

我深信东原的思想,有一部分是受颜李学派影响而成。虽然在他的著作中一点实证也找不出来,但我觉得这件事有可能性。试大略寻一寻他的线索,一、方望溪的儿子方用安为李恕谷门生,望溪和恕谷论学不合,用安常私自左袒恕谷,是桐城方家有能传颜李学的人。东原和方家人

① 载《饮冰室合集》,文集第十四册,《饮冰室文集》之四十。

素有来往，方希原即其一（集中有《与方希原书》），所以他可以从方家子弟中间接听见颜李的绪论。二、恕谷很出力在江南宣传他的学派，当时赞成、反对两派人当然都不少，即如是仲明这个人，据《恕谷年谱》知道恕谷曾和他往复论学，据《东原集》又知道他曾和东原往复论学。《仲明年谱》中，也有批评颜李学的话。或者东原从他或他的门下可以有所闻。三、程绵庄是当时江南颜李学派的大师，绵庄死的时候，东原已三十岁了，他们两位曾否见面，虽无可考，但程绵庄和程鱼门是挚友，鱼门、东原交情也不浅，东原最少可以从二程的关系上得闻颜李学说乃至得见颜李的书。

梁氏这段话，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推测，所提出的三个假设，没有理由可以成立。当时颜李之学，并没有盛行于江南。即使有人见过颜李的书，不一定都尊信其说。像梁氏所举的程鱼门（即程晋芳），虽很推崇程廷祚，但不赞成颜李之学。《勉行堂文集》中的《正学论》，便力诋颜李，并驳戴震，大为程朱辨冤。所以他虽明知程廷祚得力于颜李，在替廷祚作墓志铭时，竟不提及颜李之学。可知当时学者们凡是知道有颜李之学的人，不等于便会引起宣传和介绍的作用，又何由能肯定戴震是从朋友处间接得了颜李之传呢？后来胡适写《戴东原的哲学》，和梁启超的看法是一致的。梁书成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九日，胡书脱稿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三日，当时同住北京，必然是商讨过的。

梁启超、胡适对这一问题错误看法的原因有二：一则看到

戴望《颜氏学记》有云：“乾隆中，戴吉士震作孟子绪言，始本先生此说言性而畅发其旨。”便肯定戴震学说的全部，都渊源于颜习斋而推衍之。二则那时杜威来中国讲学不久，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，成为一种时髦学说。梁启超、胡适等人，认为我国三百年前的颜李学派，和杜威们所提倡的，有许多相同之点，而且有些地方比杜威所谈，更加彻底。于是梁、胡诸人，在当时大谈其“颜李之学”，使之成为最时髦的学问。既把“颜李”提得很高，不能让这一学派没有传人，于是硬拉戴震来作颜李的替身。这种唯心的“大胆假设”的说法，显然是错误的。

况且戴震的学术和思想体系，和颜李学派有根本不同之点。颜元是坚决主张从实事实物中去实习，去实行，反对以诵读著述为学。所以他在《存学编》里大声疾呼地说过：

以读经史，订群书，为穷理处事，以求道之功，则相隔千里；以读经史，订群书，为即穷理处事，而曰道在是焉，则相隔万里矣。

这是何等激烈的言论！他的学生李塉，虽未能尽守师说，然治学途径，究与后来朴学家们异趣。像戴震在《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》中所说：

故训明则古经明，古经明则贤人、圣人之理义明，而我心之所同然者，乃因之而明。贤人、圣人之理义非他，存乎典章制度者也。

这分明说明了戴氏精神所注，是围绕在故训和典章制度之间做工夫的。颜氏所反对的“读经史，订群书”，恰是戴震所强调的。这自然是他们根本分歧之点。戴氏早年，尚守宋儒义理，后虽自出己见，别标新说，议论有与颜李相通处，只能说是偶合，没有证据硬可肯定戴学出于颜李。

大抵清代朴学家们治学的规模次第，莫不奉顾炎武为大师。这可从三方面说明问题：一、顾氏宗仰朱熹^①，而朴学家如吴之惠栋、皖之江永，都继承了这一传统。惠栋的父亲惠士奇，自书楹联有云：“六经尊服郑，百行法程朱。”^②江永既替《近思录》作注，又继承朱熹之志，成《礼书纲目》。戴震既问学于江永，宗尚相同。平日教人研究《周易》，当读程子《易传》^③。可知朴学诸儒，不独惠、江等人推尊程朱，连戴震平日对宋儒之书，也并不全盘否定，这明明和顾炎武的见解是一致的。二、顾氏平日强调：“读经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。”后来乾嘉学者们无一不是从文字音韵入手，戴氏更提倡最力。三、顾氏在《答施愚山书》中说过：“古之所谓理学，经学也。”意思是说：古人所谓理学，是从经学里面提炼出来的。应该从群经中寻找义理的旧解。像戴震的《原善》、《孟子字义疏证》，便是沿着这条道路而取得的成功的作品。扬州诸儒中如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、《论语通释》，阮元的《论语论仁论》、《孟子论仁论》，都是远师亭林、近法戴氏，用归纳的方法，引据群经旧义来说明

① 详拙著《顾亭林学记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

② 江藩《国朝宋学渊源记》引。

③ 见段玉裁所编《戴东原先生年谱》。